

从《再生缘》看陈端生的两性观

佟 迅

(东南大学 对外汉语培训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6)

摘 要 《再生缘》这部弹词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作者陈端生对男女地位、价值、才能、品格等多方面的思考,抨击了“男尊女卑”、“女不如男”等传统观念,颠覆了“三纲”“五伦”等封建秩序,并对男女在爱情、婚姻方面的不平等进行了揭露和控诉。本文从以上三点分析探讨了陈端生的两性观,从而印证其激进、自由思想在当世便足以惊世骇俗。

关键词 《再生缘》 陈端生 女胜于男 颠覆三纲

中图分类号 :I207.41

文献标识码 :A

文章编号 :1671-4970(2005)04-0064-04

清代乾隆三十三年(1768),陈端生(1751~1796)这位十八岁的“深闺千金”,拿起了她的生花妙笔,创作了一部长篇弹词——《再生缘》。作品通过一群富有才干、胆识过人、勇敢坚强的奇女子的所作所为,彻底颠覆了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“君、父、夫”三纲,解开了“三从四德”等一套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,把女性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这部巨作虽未完成(只有十七卷),但在结构、文词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,足以使它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。陈寅恪对《再生缘》也大加推崇:“《再生缘》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,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。”^[1]

陈端生的激进、自由精神在其两性观中有鲜明体现。本文拟结合作品进行分析,探讨陈端生的两性观。

一、女胜于男

陈端生在《再生缘》中精心刻画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。主人公孟丽君自幼才华出众,自恃甚高,有“但凭才学干功名”^[2]的不凡志向,一旦事变风波起,家人乱成一团时,她女扮男装,飘然远走他乡。走出闺门之后,男装的孟丽君就有了施展抱负和才能的自由天地。她如愿以偿地中了状元,当了宰相。陈端生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她惊人的才干和超人的智慧,渲染她的政绩。她“事事刚明有主张”^[2],不但称职胜任而且游刃有余,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,以致一旦称病告假,阁中竟“诸凡无主乱纷纷”^[2],代理的孟、梁二相(孟丽君的生父和“岳父”)无力处置,索性全部推给皇帝。令往日悠闲无

事的皇帝焦头烂额,感慨万千:“那郅保和在阁的时候,何曾要朕费一些心力?各省文书奏本临,都是他预先决断预先评。准拟了,该轻该重该何等。调停了,宜紧宜迟宜怎生。……就有疑难诸政务,也是他短章附入预调停。桩桩委籍才情广,件件安排智量深。”^[2]可以看到孟丽君治国为政的能力超群出众,远胜于资深望重的孟、梁二相。

孟丽君的才华“真真压倒满朝人”,而且善于指导士子,提携后进。这些饱读诗书的男子也不由得对她心悦诚服、甘拜下风。因此,“贤相之名天下闻”。孟丽君在男性社会所崭露的聪明才智和事业功绩,达到了连真正的男子也未必能达到的辉煌巅峰,确实是“高才女子胜须眉”^[2],令众多男子汗颜。

书中另一男装丽人卫勇娥,尽管所占篇幅不多,却与孟丽君一文一武,各有特色。勇娥本是将门之后,遭遇灭门之祸时,女扮男装逃亡他乡。途经吹台山,凭着高超的武艺杀了贼首,从此在吹台山占山为王。在她的率领下,吹台山义军屡次击败官军,活捉朝廷大将,连国舅刘奎璧也成了阶下囚。

在征东之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女将军皇甫长华,是书中又一个武艺超群、足智多谋的女性。她自幼“蕙质超俗”,以致父亲每逢难题,“便教长华决疑难”。在父亲被俘、全家被抄之际,她方寸未乱,替弟弟少华设计周密的出逃计划。后来寄身吹台山,替勇娥出谋划策、招兵买马;征东战中,率领女兵勇斗番将,指挥若定,威风凛凛;后成为国母,又将六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太后也是作品中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,精通“明君治世”的道理,并时常教导少年天子治

国经验。当征东告捷,诸功臣回朝受封时,她见皇甫长华与卫勇娥都是绝色佳人,就有意立其中一女为后而将另一女赐婚征东将帅。她深知皇甫与卫家“结为羽翼已齐心”,且拥有重兵,“皇家稍有相轻处,必定忠臣变佞心”。况复他们俱一室,少年天子易欺凌。立其爱女为皇后,骨肉相关不异心^[2]。

书中的女性都具有惊人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干,而男性的才智都远不及女子。皇甫少华之所以能在抄家灭门之祸中保全性命,全在于皇甫长华的精心谋划;夺状元、拜元帅又靠孟丽君提携;乃至征战告捷、封王受赏又都靠长华和卫勇娥所立汗马功劳。孟士元与梁鉴虽与孟丽君同朝为相,但日常政事均由丽君处置,他二人竟一件也办理不清。皇甫敬则遇事多请教妻女,一旦闯出“祸”来,又赶忙推卸责任。就连九天至尊的皇帝也是平庸之辈,刘家父女在身边时,他就自认:“外边国丈专朝政,内里中宫佐寡人。”^[2]奸佞清除后,一文一武的两位乔装丽人——孟丽君和卫勇娥被他倚为膀臂,宫中则靠长华和太后为他谋划。因此事实上这些女性才是皇帝江山的真正支柱,这对男性主宰的世界,无疑是绝妙的讽刺。

男子不仅才干不如女子,胆略亦逊一筹。孟士元惧祸怕灾,遇事唯唯诺诺,全没自己主张。皇甫敬对孟丽君又惧又怕,百般讨好。让苏乳母当堂认亲的计谋失败后,他立刻将责任全推给她,苏乳母对他也不由轻视。他的胆小怕灾更是让尹氏夫人大为恼火,当众斥责他:“亏你做到当朝国丈,极品亲王,一个郾丞相就这般惧怕起来。这般事件我承当,不要你,多说多言空着忙。试试妾身才智看,管娶那,为官媳妇进门墙。”^[2]使这位不敢“自家做事自家当”的王爷威风扫地。皇甫少华也有畏祸怕前的毛病。当初比箭夺袍,他就犹豫退让,既怕伤了和气,又怕万一出丑,打定主意要“低头让别人”。这引起了母亲和姐姐的不满。尹良贞恼怒地斥其无知:“枉作堂堂一少年”。长华用激将法劝他,并设计使他最终赢得了赌射。可见畏缩退让、无计可施的是男子,而积极进取、足智多谋的倒是女子。

这的确是一个“颠倒阴阳”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女性无论才智、学问,还是胆识、能力,都远超男性;在这个世界里,女性以坚强不屈的意志支撑了家庭乃至整个国家;在这个世界里,男性,包括主宰万民的皇帝,都不得不屈服于女性。《再生缘》将女性的才情、个性张扬到了极致。就现今而言:“女胜于男”这种观点实属偏激。作为自然人,男女在生理结构上各有所长,因此能力也有所差异,不能就此断言优劣。但在那个时代,陈端生之所以发出如此强烈、

激进的呼声,有其深刻的历史、社会根源。

在三千多年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,女性一直处在十分低微和卑下的地位,在道德上、法律上、习惯上都受到各种压迫和束缚,长期为男性所操纵;“重男轻女”便是封建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。《论语·阳货》中即断言: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近之则不孙,远之则怨。”东汉班昭的《女诫》七章,更是专为妇女制定的法规。她把男尊女卑、夫为妻纲、三从四德等观念和古训,系统地陈述为“卑弱”、“敬顺”、“专心”、“曲从”之类的封建道德教条。第一章即开宗明义地确定了女性的地位——卑弱:“古者生女三日,卧之床下……明其卑弱,主下人也。”^[3]阴阳殊性,男女异行,阳以刚为德,阴以柔为用;男以强为贵,女以弱为美。^[3]对女子阴弱的要求竟到了这种地步。

陈端生出自诗书世家,自幼能诗善画,和她的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华闻名于世,母亲汪氏家学渊源,也长于文学。而陈家男子中,除了祖父陈句山望重当世,伯父玉万、父亲玉敦才学均较平庸,同辈弟弟们年尚幼稚,还未能有所表现。因此陈端生心中对“女劣于男”之说颇为不平,用她的作品颠覆了“女不如男”的传统观念。《再生缘》中的女性世界实际上正是陈端生自尊、自由、独立思想的化身,是对妇女社会地位卑下的抗议,更是对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、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”等谬论的反驳和抨击,因此在当时确有进步意义。

二、颠覆“三纲”

三千多年的男权社会中,女性的地位和遭遇较为悲惨。以男性为出发点而制定的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、“三从”、“四德”、“七出”像几股巨大的绳索缠绕在她们颈上。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就指出:“臣事君,子事父,妻事夫。三者顺,则天下治;三者逆,则天下乱。”^[4]西汉董仲舒根据孔孟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伦理纲常,提出了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的“三纲”说:“君臣父子夫妇之义,皆与诸阴阳之道。君为阳,臣为阴;父为阳,子为阴;夫为阳,妻为阴。”^[5]又把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的关系概括为“五伦”。君、父、夫是臣、子、妻的主宰,后三者的命运沉浮、生死荣辱都操纵在前三者手中,这使得妇女成为丈夫、乃至整个男性社会的附属品。这些封建礼教苛条,像无形的锁链枷在妇女身上,使她们动辄得咎,有志不敢展,有才不得施,有情不敢抒,而满足于“柔顺温恭,周旋室中”^[6],成为男性驯服的奴隶。

而在《再生缘》中,以“目无丈夫、目无兄长、目无

父母、目无君上^{〔7〕}的孟丽君为典型,处处显露出强烈的叛逆、反抗精神。当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“三纲”、“五伦”,在这群女性面前遭到空前的藐视,最突出地表现在君权上。皇帝是男权社会绝对权力的象征,然而皇帝并没有受到这些女性的尊崇与敬畏。当朝廷许婚的圣旨下达时,孟丽君毅然抗旨逃婚。在朝为官又无视朝廷的威严,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怒撕奏本,好色的皇帝得知她的女性身份后,精心布下一个个“风流阵”,而她不为皇帝的“隆宠”所动,正言厉色地拒绝挑逗,她的一身正气,使得君王对她又敬又怕又爱。

书中另一女扮男装的丽人卫勇娥在吹台山“道寡称孤如帝王,礼贤下士作英雄。”手下将士人人信服,都说“定要真龙夺假龙”^{〔2〕},公然与皇帝分庭抗礼。

皇后向来母仪天下,是恪守封建道德秩序的典范。而皇甫长华被立为国母后,并未收敛将军习性。她对深宫内院的虚伪与拘束深感不满,向母亲抱怨:“凤阁龙楼到像监。”^{〔2〕}当着皇帝的面,她也时而冷嘲热讽,时而反唇相讥。后来又直接干预少华的婚事,与皇帝斗智斗力。

皇甫长华的母亲尹良贞身为朝廷诰封的一品夫人,却格外“刚明”、果敢。在吹台山初见卫勇娥,就觉得“他”不但生成豪杰貌,更兼还有帝王形。莫非元运应该绝,正出兴亡定霸人^{〔2〕},因而将千金许配给他”。在她看来元帝竟还不如眼前的山大王,造反者倒成了“兴亡定霸人”。而且她还有和皇帝直接交锋的胆量,为了儿女的幸福,要“拼将万刚与千刀,揽海翻江闹闹朝。那怕君王规矩重,且骂顿糊涂天子赴阴曹。”^{〔2〕}

对“父权”的违逆在孟丽君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。她泰然地与“父兄同殿作公卿”,时而官威十足,时而彬彬有礼,令人捉摸不定,并常有“忤逆”之举:被邀至孟府替母看病,为能“免祸”脱身,故意打趣父亲:“尊夫人有何心病?莫非是老前辈近纳如君么?”在皇帝面前,她又面斥父亲孟士元及母亲韩氏,以致父母遭受羞辱;公公皇甫敬更对她惧怕三分,常常“兢兢战战胆魂消”,对她百般迁就,不敢稍有得罪。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“少年刁滑小英才”,让父母、翁姑大伤脑筋,束手无策。

对皇帝尚且轻视,“男尊女卑”、“夫为妻纲”之说对《再生缘》中的女性更没有什么束缚。女性向来所受的传统教育,是妇女要专心事夫,丈夫是妻子的天,做妻子的只能永远忍气吞声地做丈夫的附属品。东汉班昭所作的《女诫》,便是压制女性的沉重枷锁。她在阐述“夫妇之道”时,特别提到:“夫不御妇,则威仪废缺;妇不事夫,则义理堕阙,方斯二者,其用一

也。”^{〔3〕}因此,“敬顺之道,为妇之大礼也。”^{〔3〕}而“三从”之道,以从夫为最要:“夫者天也,天固不可违,夫固不可离也。行违神祇,天则罚之;礼义有愆,夫则薄之。”^{〔3〕}所以事夫如事天,与孝子事父、忠臣事君是等同的。事夫要“直不能争”、“曲不能讼”。然而,我们从《再生缘》中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孟丽君借着师尊的地位,对门生丈夫大摆威风,全不把他放在眼里,来了一崭新的“事夫章”。她以师尊的身份安然接受丈夫的跪拜,并在上表认亲的风波中,“金銮殿上发威光”;“大震雷霆撕本章”,怒斥少华,大摆老师的威风吓人,要问少华一个戏师欺君之罪,不由不使少华又敬又怕。

在《再生缘》中,堂堂天子对皇后有几分忌惮,几个大臣外惧朝廷,内惧妻子:“孟士元”一些不敢自专驱”,以惧内闻名朝野;皇甫敬只会以冷嘲热讽隐藏自己的怯懦。皇甫少华碰到孟丽君向来“辨色察颜加敬重”;“仰眉承欢更谦恭”,低声下气,全没半点威风。男子对女子的忌惮恰和女性们对“三纲”、“五伦”的蔑视形成鲜明对照。陈端生以此对男女在社会、家庭中的传统地位提出崭新的思考。

三、一夫一妻

《女诫》中说:“《礼》夫有再娶之义,妇无二适之文。”^{〔3〕}因此历代的文学作品中,女性的冰清玉洁、忠贞守节和男性的三妻四妾、到处留情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《再生缘》之前出现的大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才子佳人小说,虽提出了与封建礼教相悖逆的新观念,对青年人大胆追求恋爱婚姻自由充分肯定与赞扬,但在这方面仍有较大缺陷。一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甘成为父母、长辈随心所欲的支配物,敢于追求婚姻自主权,迈出了自我解放可贵的一步。但是她们的思想仍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,摆脱不了一夫多妻制的束缚,因此多落入一个模式的俗套中:女扮男装出走的女子多在半途中遇到另一不识真相的女子,或爱慕男装丽人而倾心相许,或父母器重以女许之,而“假男子”都假意应允,先娶过来,日后又“二女同事一夫”,情同姐妹。甚至在有的作品中女子竟千方百计为情郎谋娶意中人。这些为男姓津津乐道的“美谈”、“佳话”,是男权社会的产物。男尊女卑的社会创造了一夫多妻制,丈夫可以三妻四妾、用情不专,自然会使妻子不平,激起妒心,这是对压迫的一种自然反抗。男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,长久以来宣扬“妒忌”是妇人的恶德,悦夫是妇人的本分。长此以往,在这种社会观念的灌输影响下,女子便以宽容不忌为美德了。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都是男性,从他们的立场出发,自然要赞美女子婉

顺、大度,以便妻妾相安,使男子可以陶醉在温柔乡里。这实际上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又一表现。

《再生缘》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。陈端生通过对男性相当微妙的讽刺和揭露,表现了她对妻妾制的不满。男子可以妻妾成群,女子却要一而终,这无论从地位,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不公平的。她热情赞颂了两位坚贞的女性,苏映雪和刘燕玉,对荣华富贵视如草芥,为了终生相许的恋人而和圣旨、和父母之命抗争。刘奎璧身为国舅,也算是“风流一少年”,苏映雪生于寒儒之门,能嫁入刘家,应该是让她满意和庆幸的。而她为了梦中的誓约,就抱定“此身永不另成双”^[2]的决心,不羡侯门富贵,刺伤仇敌,自己“珠沉玉碎”,维护了梦中的誓约,也维护了正义。另一位郡主刘燕玉,也为了小春庭里的私订终身,拒绝父母为她所作的婚姻安排,悄然出走,避入尼庵中,被折磨得消瘦憔悴不堪,仍是不改初衷。

和她们对爱情的忠诚相比,男子们则大为逊色。皇帝贪婪好色,见到皇甫长华和卫勇娥,便动过“长华皇后勇娥妃”、“两个如花一总收”^[2]的念头,后来虽恋恋不舍地将勇娥许配给熊浩,心里仍颇有遗憾。待得知酆相原是女子,更动了觊觎之心,对她软硬兼施,不许她承认是孟丽君,以便入宫为妃。甚至在梁府见到素华,又想把她也接进宫中,占为己有。作者借皇甫长华之口斥之为“当今无道一昏君”^[2]。

对皇甫少华为孟丽君守义,作者虽作了充分的表现,但少华的独占三美、用情不专,作者内心深处是不以为然的,因此时而加以巧妙的揭露和揶揄。小春庭蒙燕玉搭救,他本可以已聘孟氏为由坚辞许婚之意,但却在燕玉的美貌下心有所动:“我看青春刘燕玉,可相同,孟家楼上那裙钗,风流态度般般胜,瘦弱腰肢样样精。也是天公留巧遇,不妨定下此娉婷”^[2]。于是又与刘氏缔结婚约。虽是出于感恩,但绝非忠于爱情的表现。第八卷第三十回,当皇甫少华听到丽君死讯时,虽也“泪如雨下有悲声”,但接下来却是:“袍中取出香罗帕,手拿着,郡主贻珍哭丽君”^[2],这分明是其虚伪性的露骨表现。后来得了孟丽君真容,为她惊世骇俗的容貌所痴迷,便“近来心在其容上,更把贻珍不挂胸”了^[3]。他的这份痴迷,

虽说是受丽君忠贞所感,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受丽色吸引。甚至在与刘燕玉的新婚之夜,他居然抛下新娘,独自去了灵凤宫;“凝神细视画中人,不觉长吁微点首,低言委实胜新人。刘家郡主虽美貌,受过摧残太瘦生,两颊桃花俱减尽,不如初见小春庭。惟吾原配真称绝,倒只怕,今古无双第一名”^[2]。他为丽君守义三年,这固然值得称道,但也造成了另一位女子的不幸,辜负了为他历经折磨受尽苦难的刘燕玉,使她在美满的婚姻形式下,实际上过着凄凉孤苦的生活。这正是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造成的恶果。而归根结底,又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的罪恶。

陈端生所向往的是没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自由婚姻,两情相悦,忠贞不渝。在那个时代,她已隐约看到了一夫多妻制的根源在于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,在于女性不能在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等方面独立自主。在那个时代,她无力公然宣扬一夫一妻、婚姻自由,只能借笔下的人物拒绝不平等的婚姻,让桀骜不驯的孟丽君挟着自身超人的才干和“嵬嵬宰臣官俸”,大胆说出了“何须必要归夫婿”、“自身可养自身来”^[2]这样带有女性独立、女性解放色彩的言论。

总之,陈端生以她的生花妙笔精心构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两性世界,表达了她的女性理想,以此作为对男权社会、男权秩序的有力抨击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寅恪.论《再生缘》[A].中华文史论丛(第八辑)[C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305.
- [2] 陈端生.再生缘[M].郑州:中州书画社,1982.129,124,880,880,183,408,122,820,107,854,103,887,24,390,855,36,400,496,542,607.
- [3] 班昭.女诫[A].蒙养书集成(二)[C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1990.38,41,40,41,44,44.
- [4] 韩非.韩非子全译[M].张觉译注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2.1090.
- [5] 董仲舒.春秋繁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432.
- [6] 徐士俊.妇德四箴[A].香艳丛书(第十二集卷四)[C].宣统二年(1910)排印.
- [7] 郭沫若.《再生缘》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[N].光明日报,1961-05-04(2).

·简讯·

河海大学成功申报江苏省循环经济工程中心

河海大学依托东部资源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中心,向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功申请组建了“江苏省循环经济工程中心”,成为江苏省第一个经济管理类的工程中心。该工程中心的成功申报,对我校人文社科及经管类的学科发展及成果推广具有重要推动意义。

(本刊编辑部供稿)